

· 西方哲学 ·

20 世纪反实在论语境分析方法的建构

胡 瑞 娜

一、20 世纪反实在论对语境分析方法的选择

随着 20 世纪“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以及“修辞学转向”的演进，反实在论在与实在论的论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为了在论争中取得优势，20 世纪的反实在论在其科学哲学研究中相继引入了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作为其重要的分析方法。但是，反实在论者在反思其发展历程时却发现，如果孤立地对待这三种分析方法，它们都有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

首先，语形学及其分析方法尽管因为采用一阶逻辑进行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消除了模糊、歧义、不必要的复杂以及其他理解障碍，从而使理论具有了普遍性、精确性以及哲学上的透明性，但是，传统的语形学把人类认识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对知识中逻辑关系的发现，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企图用“科学的逻辑”来取代哲学，这一点带有极大的片面性。因为通过使科学的概念确切化，通过对科学理论的结构、方法等的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仅仅是哲学的任务之一，而不是全部；决不能把哲学仅仅理解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甚至把方法论等同于狭义的逻辑。这样做过分夸大了语言符号形式化的意义，使它们脱离所表示的客观现实对象，从而导致把它们当作是人们“约定的”或任意构造出来的东西这样一种结果。其次，语义学及其分析方法尽管作为一种横断的研究方法论在科学哲学中越来越占据了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科学哲学的纵深发展，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者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语义学及其分析方法并非是万能的，它不可能在一切领域都发挥功效：它仅仅能够“为语言提供一种语句意义的完全解释，而不能为语句如何在言说中被使用来传达语境中的信息提供一种解释”（Kempson, p. 139）；它只能“通过说明语言句子的真值条件来研究句子和表达它的命题的搭配规则，而不能探究那些不能直接指向句子表达的真值条件来说明的言说意义”（Gazdar, p. 2）；它对语言意义的理解是独立于语境而非依赖于语境的。最后，语用学及其分析方法尽管进一步排除了存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语言的形式结构与心理的意向结构之间、逻辑的证明力与论述的说服力之间、静态的规范标准与动态的交流评价之间的僵化界限，但是，语用并不是特定的问题可以在其中展开研究的建设性理论构架，它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往往在语言的使用这个一般层面上模糊乃至取消了所考察问题在次语言基底上的独特性。因此，如果离开特定的语境而单独运用语用分析方法，则会由于缺乏一个有着次语言边界的理论空间或问题域而显得太过宽泛，从而使得对科学理论或哲学理论的说明和解释没有任何确定性可言。（参见郭贵春，第 52 页）这是因为，对科学理论的解释、说明之所以是适当的，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我们特定语境中难题的求解。没有任何一种解释和说明是唯一正确的，不同语境中的不同解释和说明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换句话说，“不存在超语境的、具有独立意义的正确说明”（Leplin, p. 11）。

“语境原则”（context principle）是弗雷格为了探讨数的概念在《算术基础》一书中提出来的。

在弗雷格看来，必须在句子的联系中研究语词的意谓，而不应个别地研究语词的意谓。弗雷格之后，罗素在其摹状词理论中也主张命题构成了语词的意义语境的观点，从而对弗雷格的“语境原则”有所发展。其后，反实在论重要的思想先驱维特根斯坦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弗雷格和罗素提出的“语境原则”，而且对其中隐含的整体论因素加以扩展而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在他看来，事实和命题的最终成分和还原方法并不是唯一确定的，可以存在多种分法和不同结果；按逻辑规则得到的基本命题并不一定比被还原前更精确和明晰；并不存在终极的绝对简单的对象和名称，我们处于语言、行动以及情景交织的语境中。显然，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语言不仅仅内在于一定的命题体系结构当中，而且从本质上讲，它还与人类基本的存在状况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在这里，语境就不仅是语言的上下文情景，即静态的语言形式系统，它更是一个内涵了历史、社会、心理以及人类生活习惯和信仰等多个层面的具有动态结构规定性的复杂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原则”克服了语形、语义、语用这三种分析方法的分割，并在其基础上使这三者获得了整体上的互补。

20世纪的反实在论者因此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语境原则”，将语境作为重要的分析方法从整体上引入科学哲学研究中。为了克服早期逻辑实证主义单纯强调语法分析的语形学而忽视语言使用及其具体语境的局限，逻辑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莫里斯指出，任何一种语言系统都不外乎是通过人类这种有机体来实现的，恰恰是人类的这种有机体性决定了语用学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心理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各种现象。因此，语言只有在人类的相互交往中，只有在人类相互交往而产生的具体的、整体的语境中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亨普尔在其意义的标准理论中也明确指出，科学就是一个语言系统，它并不单纯是一些各自孤立的命题的简单集合，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或者说，是一个具有良好结构的整体性的理论系统。因而孤立地谈论一个词项或一个陈述的“经验意义”是不正确的。亨普尔将语境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科学语言系统以及一些辅助性条件。为了更具体地阐明其语境原则，他将科学理论系统或理论结构形象地比喻成一个保护杂技团演员的“安全网”。在这个安全网络中，最底层是观察层次，支撑杆是语法规则和语义规则，网线是公理系统，网结是理论语句，而最终将它们联结为一体的则是对它们的使用，而恰恰是在这具体的使用中体现了以语境为基底的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

亨普尔的语境原则的确鲜明体现了语形、语义和语用在经验观察基底上的统一，彰显了语境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但是，他仅仅强调语境的经验观察层面而忽视了语境所应该涉及的历史、心理和社会等因素的存在，这是他的理论的一个缺陷。正是鉴于这一不足，在逻辑经验主义之后，历史主义对语境原则进行了重建。库恩在其科学哲学理论中所提出的范式就是一种语境论的观点。库恩的范式不仅包括整个科学语言系统以及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模型集，而且还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仰或信念也涵盖进来。可见，他的语境论较之逻辑经验主义而言宽泛了许多。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库恩的“范式”语境论虽然体现了科学的整体性特征，并且也提出了科学理论系统内在结构的思想，但是却没有具体地指出这一结构的具体内容，而且他还把语境所涉及的心理因素过分夸大，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极端的心理主义和相对主义。

针对库恩的缺陷，拉卡托斯提出了他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在他看来，由于经验不能证伪各自孤立的理论，因而科学的最基本单元不应该是各个孤立的理论或命题，而应该是互相联系、且具有严密的内在结构的完整的理论系统。只有以整个科学理论系统或科学研究纲领为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而不是以各自孤立的单个理论或命题为对象，才能正确地理解和解释科学理论的证伪和发展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理解和阐明科学理论的坚韧性和科学发展的继承性等问题。正像他所说的：“我们评价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或理论的集合，而是整个理论系统。因此，精致证伪主义就把怎样评价一个个

别理论的问题转变为怎样评价整个科学理论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理论，而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才能被称为‘科学的’或‘非科学的’；如果对一个孤立的理论使用‘科学的’术语，那就犯了使用范畴的错误。”“只有把科学解释为研究纲领的场所而不是孤立理论的场所时，科学的连续性和理论的坚韧性等问题……才能得到解释。”（拉卡托斯，第 34 - 35、87 页）显然，在拉卡托斯这里，语境并非是纯粹的心理的信念，它还具有科学的理性。它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特征，而且还反映了科学的理性特征。恰恰是在这一语境中，语形、语义在语用中实现了统一，语言使用的主体与语言所指称的对象达到了一致。正像劳丹在给研究传统下定义时所指出的：一个研究传统是关于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实体和过程以及关于该领域中用来研究问题和构造理论的合适方法的一组总的假定，它具有历史性、规范性和普遍性；它能够为我们提供具体理论发展所依赖的指导原则。

20 世纪的反实在论之所以引入“语境原则”，选择语境分析方法作为其方法论重构的基点，这并不是偶然的、一蹴而就的：这一抉择既是反实在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是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迫切要求与历史发展使然。可以说，正是由于语境分析方法的渗透，20 世纪的反实在论作为对科学进行哲学解释和理性重构的一种思潮或运动，愈来愈成为人类理性发展和科学哲学发展中的一支劲旅，显示出了其勃勃的生机以及独特的风格、特征、形式和发展趋向。

二、20 世纪反实在论科学解释的语境化建构

科学解释（scientific explanation）是 20 世纪科学哲学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作为科学哲学重要分支的反实在论在其科学哲学研究的过程中，也始终将揭示科学解释的一般方法和特点、探求最佳的科学解释模型，作为其科学哲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最早给出科学解释模型的是亨普尔。他首先提出了“演绎 - 规律”模型（Deductive-Nomological，简称 D-N 模型），或称“覆盖率模型”。按照这一模型，一个适当的科学解释不仅应该适用于说明个别事件，而且还应该适用于说明某些普遍定律；不仅适用于说明事件的发生，而且还适用于对未来事件进行预测。亨普尔的这一科学解释模型提出之后引起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广泛关注，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否定性批评，如汉森、库恩等人就分别从格式塔心理学和历史解释的层面对它进行了攻击。内格尔等人也指出，D-N 模型只适用于必然性的科学事件和严格的普遍性定律而不适用于或然性科学事件。正是基于这些批判，亨普尔提出了“归纳 - 统计”模型（Inductive-Statistical，简称 I-S 模型），以克服 D-N 模型所面临的困境。与 D-N 模型不同，I-S 模型可以应用于或然性科学事件。这是因为，亨普尔将统计分析和概率分析引入科学解释中，从而由对普遍性、规律性事件的说明转向了对或然性、特殊性事件的解释，从纯粹逻辑演绎的绝对性走向了概率分析的相对性。事实上，在这里，对或然性事件、特殊性事件的关注已经隐含着语境原则。因为，或然性事件、特殊性事件就是具体的特定语境，而一系列或然性事件、特殊性事件则是一个问题域。只有在具体的特定语境中，只有在具体的问题域中，只有在具体的、特殊的事件中，才能给出适当的科学解释。显然，尽管亨普尔在其科学解释模型中并没有明确提出“语境原则”，但是从其 I-S 科学解释模型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到亨普尔已经认识到了具体的特定语境在对科学理论进行解释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而将其意义的标准理论中所运用的语境原则也渗透到了其科学解释中。可以说，正是亨普尔的 I-S 科学解释模型，开启了 20 世纪反实在论科学解释模型语境化建构的历史。在此之后，20 世纪的反实在论进一步将语境分析方法应用于其科学解释中，使得语境分析方法得以深化和进一步完善。

逻辑经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赖欣巴赫为了更好地解释微观世界中的异常现象，引进了两个术语：“详尽解释”和“有限解释”。所谓“详尽解释”，就是既包括对可观察现象世界的解释，又包括对

不可观察的中间现象世界的解释，是一种完全的解释。而所谓“有限解释”，则是只限于对可观察的现象做出解释，而不包括对不可观察的中间现象世界进行解释，是一种不完全解释。（赖欣巴赫，第 33 页）在赖欣巴赫看来，微观世界的特点就在于不存在一种正常的适用于全部中间现象的详尽解释，这是因为，对于微观世界中的一些不可观察现象，譬如，量子力学中的微粒解释与波动解释，我们是不可能通过普遍性规律或正常的因果律去解释的，而只能借助于有效的约定性假设来对它加以把握。因此，为了在科学解释中消除由于对微观世界进行“详尽解释”所带来的“因果异常”，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放弃“详尽解释”而采用“有限解释”。事实上，这种所谓的“有限解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方法论策略，正是通过这一“有限解释”策略，我们才能摆脱本体论对我们的纠缠而走向对科学理论的合理解释，从而可以使处于不同世界观的人们在公共的科学语言系统内、在具体的语境基底上进行对话与交流。在这里，“有限”就是对语境原则特性的表征。因为，语境尽管是开放的，但它无论如何都必然是有限的开放，它是一个有着界限的理论空间或问题域。正是在赖欣巴赫的“有限解释”中，体现出语境分析方法的开放性与有限性、整体性与个体性及特殊性的结合；也正是在这种结合中，语境分析方法得以展开。

无论是亨普尔的 I-S 科学解释模型还是赖欣巴赫的“有限解释”的科学解释模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出“语境原则”的方法论功能，但事实上它们对语境这一分析方法在科学解释中的意义的认识都还只是潜在的、不完善的。真正将“语境原则”的本质之一，即强调在语境分析的基底上进行科学理性的说明和解释体现出来的，是当代著名的反实在论者、建构经验主义的倡导者范·弗拉森。

范·弗拉森在考察了传统的科学解释方法之后发现，以往科学解释观中存在着三种错误观点：第一，认为解释是理论或假说、现象或事实之间的简单关联；第二，认为解释力不能在逻辑上和一个理论的特定优点特别是其相关真理性或可接受性相分离；第三，认为解释即是科学探索的结局。范·弗拉森认为传统解释模型之所以面临困境，关键在于它们将科学解释局限于理论的语义学特性，并束缚于理论与事实的静态的双边关系中，而事实上，科学解释应是理论、事实和语境三者之间的动态的多边关系。而且，也恰恰是因为这种静态的二元关系，引发了传统“解释循环”难题。传统“解释循环”的核心问题，就是解释与理解必须先由部分开始，而要理解部分，又必须首先理解整体。具体到科学哲学领域就是，理论描绘了整个世界图景，科学本身则仅仅把这个图景中的特定领域看作是可观察的，科学家在接受理论时就只能断定这一特定领域的图景是准确的。所以，要接受这一理论，就必须首先相信可观察现象是正确的。但是，离开整个世界图景，就无法相信可观察现象；而离开可观察现象，又无从把握理论的整体意义。这样，解释似乎陷入了一种逻辑上的“恶性循环”。范·弗拉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一难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解释模型脱离了具体的语境以及理论与人的动态关联。在他看来，“无论是理论评价语言以及具体的‘解释术语’，还是用于解释现象的理论使用语言，都是从根本上依赖语境的”（Fraassen, 1980, p. 91）。因此，一旦离开具体的语境去进行科学解释和说明，就必然会陷入无穷的追问和循环中。而只有在语境这个具体的框架内，即“将浸入科学语言或科学世界图景的这类概念置于语用空间当中”（同上）来进行科学解释和说明，才能避免科学解释的“恶性循环”，使“解释循环”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适当的求解。为了更好地阐释其“语境原则”，范·弗拉森给出了他的“回答问题的科学解释模型（Why-questions）”，这一模型的核心就是语境。正像他本人所说的那样，“科学解释的条件主要地是由语境和说话者的兴趣所决定的”。（Fraassen, 2002, p. 64）这样，传统解释难题在语境原则的指导下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既然问题的产生是依赖语境的，那么在某一语境中产生的问题在另一语境中也许就是无意义的或根本不可能产

生，因而“解释的拒绝”就不成其为问题。同样，在这种情况下，“解释的不对称”难题也随之而解。范·弗拉森运用语境原则最终完成了对传统解释难题的消解，从而实现了其语境分析方法的建构。

三、20 世纪反实在论语境分析方法的本质特征

从总体上讲，20 世纪反实在论对“语境原则”的引入和重新认识及其科学解释的语境化建构，在本质上体现了其整个科学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它一方面适应了 20 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整体趋向，而另一方面，它还在其语境化建构的过程中彰显出反实在论自身所独具的风格、特征和意义。具体地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鲜明的整体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语境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整体性原则。因为，如果离开整体语言，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语词。换句话说，构成单个语句意义知识的决定性功能是不可能存在的，我们不可能从理论的部分中得到理论的整体意义，因为部分离开了整体实际上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这也就是说，语境中的每一个基本要素都不可能彼此孤立地存在，相反，它们都是整体语境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像达米特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描述一个数学或物理理论时，追问任何单一陈述的内容或追问任何一个单一理论的内容都是不合理的；每一个陈述的意义或陈述的每一个演绎系统都被与整体语言中的其他陈述所具有的多种联系所修改，因此，如果不知道整体语言就不可能有适当的方式去理解陈述。而且，即使我们获得了一个陈述甚至一个理论的主要意义，这个主要的意义也仍然会由于与其他陈述或理论所建立的相互关联而被修改。可见，意义仅仅在于其在构成我们语言实践的复杂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Dummett, p. 18）显然，在这里，达米特强调了语言的整体网络对语句意义理解的重要性，因为，对语句意义的理解会直接反映在涉及真值的语句整体网络中，理解一个语句就意味着理解整个语言；如果没有整个语言网络背景，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单个语句。

另一方面，历史地讲，语境是在人们逐渐认识到语形、语义、语用三者各自的局限性之后才引入科学哲学当中的，因此，当我们运用语境分析方法时，就是要将语形的逻辑性与一致性、语义的条件性以及语用的历史性和关联性统一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语境就是对语形、语义、语用的整合，而恰恰是在这种整合功能中，语境彰显出其整体性特征。

2. 约定性特征。反实在论是针对实在论而言的，它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实在”，而仅仅是对科学理论所指称的不可观察现象的怀疑。正是基于这一怀疑，反实在论提出，科学并不给我们提供一幅关于世界的真实图画，而是提供给我们较之以前的理论更具解难题能力的理论或构造一个最佳有效的理论模型。因此，对科学理论或理论模型所进行的科学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就是一种虚构的陈述。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科学解释都无非是一种特定语境内有有效的约定性假设，而解释的有效性就在于在具体语境或问题域中我们所赋予它的约定性。对于不同的特定的具体语境，我们则会给予不同的约定性假设。正是在这一约定中，体现出语境所具有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为，语境虽然是一个具有复杂结构的整体系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使用具有普遍性，相反，对于分属于不同的特定语境中的科学理论或概念，是不能放在同一个标准或层面上来使用的，否则就会产生各种科学解释难题。这也就是说，任何一次语言分析过程都必须是在具体的、特定的、确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只有在语境的框架内，一切语形、语义和语用的法则才是合理的可生效的。只有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人们才可以通过特有的约定形式在不同的层面对可能的意义进行多元化的构造和说明。例如，哥白尼的命题“行星绕太阳运行”就不能引用托勒密的命题“绕地球运行”体系进行说明，因为这两个命题并不是单纯的事实的不同，而是具有非常大的差异。“行星”一词在两个命题中都是作

为种类用语出现的,虽然这两个种类在成员上是重复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第一个命题中所包含的所有天体,在第二个命题中也全都包括进去了。显然,在这里,一切语境都是约定的、具体的、确定的,当两种完全不同的特定语境相碰撞时,不管它们包含了多少看似相同的范畴,都会发生根本性的转换。

3. 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渗透和融合。尽管弗雷格首次提出“语境原则”的初衷是为了把心理学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区别开来,把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区别开来,但是,随着“语境”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不断深入和展开,20 世纪的反实在论对“语境原则”有了全新的理解。在反实在论那里,语境是语形、语义和语用的统一,是逻辑、意义和信念的统一。换句话说,语境就是一种包括了科学、历史、心理、社会以及理论背景等一系列因素在内的广义的语境。正是语境的这一广义性,将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同时涵盖进来,使得非理性因素渗透到了 20 世纪的科学哲学当中。正是非理性因素的渗透,在本质上不仅体现了科学、心理、文化与实践的趋同性,而且蕴含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融合的后现代走向。

四、结语

纵观 20 世纪反实在论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它们在上个世纪所发生的一系列哲学运动的转向过程中,在构造、解释和评价一系列理论难题方面,一定意义上都是与语境问题本质相关的。而且,语境作为当代科学哲学领域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分析方法,将随着哲学的未来发展进一步完善自身,从而扩展和渗透到哲学各个研究领域,发挥它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 20 世纪反实在论语境分析方法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的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一建构只是哲学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向,它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哲学的形态,否则不免会陷入泛语境论。

参考文献

- 郭贵春, 2004 年,《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辩护》,科学出版社。
- 拉卡托斯, 1978 年:《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英文版。
- 赖欣巴赫, 1948 年:《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英文版。
- Dummett, 1978,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ntuitionist Logic", in *Truth and Other Enigmas*.
- Fraassen, Bas C. Van, 1980, *The Scientific Imag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The Pragmatics of Explanation", in Balashov and A. Rosenberg, *Philosophy of Science*, Routledge.
- Gazdar, G., 1979, *Pragmatics; Implicature, Presupposition, and Logical Form*, London: Academic Press.
- Kempson, R., 1988, "Grammar and Conversational Principle", in F. Newmeyer (ed.), *Linguistic: the Cambridge Surv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plin, Jarrett, 1997, *A Novel Defense of Scientific Re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大学哲学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 刘文旋